趙岐〈孟子題辭〉箋釋

黃 俊 傑

前 言

東漢趙岐 (A.D. ?-210)《孟子章句》係歷代《孟子》註疏中存世之最古者，在孟學解釋史上有其歷史地位。清儒阮元 (A.D. 1764-1849)〈孟子注疏校勘序〉云：「趙岐之學以較馬鄭許諸儒，稍爲固陋，然屬書離辭，指事類情，於詁訓無所戾，七篇之微言大義，藉是可推。」（《孟子》，十三經注疏本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刊本，〈孟子注疏校勘記序〉，頁 15 ）趙氏注孟，雖於孟學義理，不免有所闕漏，爲後儒詬病，如朱子 (A.D. 1130-1200) 頗以「趙岐孟子，拙而不明」爲病（黎靖德，《朱子語類》，中華書局新校標點本，第四册，卷 51 ，頁 1218 ），陸象山（九洲，1139-1193 ）亦以「趙岐解孟，文義多略」爲憾（《象山全集，四部備要本，卷 34 ，頁 10 ，上-11 ，下），然趙岐長於名物訓詁，古事地望，其發明孟學亦有足多者。焦循（里堂， A.D. 1763-1820 ）《孟子正義》疏解趙氏注，屢稱趙氏「不愧通儒」（《孟子正義》，北京中華書局， 1987 ，公孫丑上 6 ，頁 234 ；離婁下 19 ，頁 568 ），雖不免清儒之見，然亦屬持平之論也。

趙岐爲人正直剛烈，不畏權勢，得罪中常侍唐衡之兄唐玹，《後漢書》本傳云：「延熹元年，玹爲京兆尹，岐懼禍及，乃與從子戫逃避之。玹困收岐家屬宗親，陷以重法，盡殺之。岐遂逃離四方，江、淮、海、岱，靡所不歷。」《孟子章句》即爲岐浪跡北海，藏匿於孫嵩家複壁中所撰，其書卷首有序言性質之〈孟子題辭〉乙篇，係孟學解釋史上之重要史料。焦循《孟子正義》已就此文加以疏解，然猶有餘義尚待發揮。本文謹簡擇相關史料，就〈孟子題辭〉所涉及之歷史背景，略加箋釋，以就教於並世通人。

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網

孟子題辭

〈孟子題辭〉者，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。

孟，姓也。子者，男子之通稱也。此書，孟子之所作也，故總謂之《孟子》。其篇目，則各自有名。

孟子，鄒人也。名軻，字則未聞也。鄒本春秋邾子之國，至孟子時改曰鄒矣。國近魯，後爲魯所幷；又言邾爲楚所幷，非魯也。今鄒縣是也。

或曰：「孟子，魯公族孟孫之後，故孟子仕於齊，喪母而歸葬於魯也。三桓子孫，既以衰微，分適他國。」

孟子生有淑質，夙喪其父，幼被慈母三遷之教。[1] 長師孔子之孫子思，[2] 治儒術之道，通《五經》，尤長於《詩》《書》。[3]

---

1. 趙岐認爲孟子「幼被慈母三遷之教」，此說蓋出於劉向《列女傳・母儀傳》：「鄒孟軻之母，號孟母。其舍近墓。孟子之少也，嬉遊爲墓間之事，踴躍築埋。孟母曰：『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。』乃去舍市傍；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。孟母又曰：『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。』復徙舍學宮之傍；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。孟母曰：『眞可以居吾子矣。』遂居之。……孟子之少也，既學而歸，孟母方績，問曰：『學何所至矣？』孟子曰：『自若也。』孟母以刀斷其織。孟子懼而問其故。孟母曰：『子之廢學，若吾斷斯織也。夫君子學以立名，問則廣知。是以居則安寧，動則遠害。今而廢之，是不免於廝役，而無以離於禍患也；何以異於織績而食，中道廢而不爲，寧能衣其夫子，而長不乏糧食哉？女則廢其所食，男則墮於脩德，不爲竊盜，則爲虜役矣。』孟子懼，旦夕勤學不息。」此種說法係漢人關於孟子的傳說之言，如《韓詩外傳》所載孟母裂織買豚及不許孟子去婦等傳說，皆未可盡信。清人崔述《孟子事實錄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），卷上，頁410-411考此三事最精。

2. 趙岐云孟子「長師孔子之孫子思」，此係漢儒之通說。《史記・孟子荀卿列傳》「孟軻，鄒人也，受業子思之門人。」《索隱》「王劭以『人』爲衍字，則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。今言『門人』者，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。」《列女傳・母儀傳》「孟子旦夕勤學不息，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。」《漢書・藝文志》〈儒家類〉「《孟子》十一篇，名軻，鄒人，子思弟子，有列傳。」《風俗通・窮通篇》「孟子受業次子思。既通，游於諸侯。」《淮南子・氾論訓》高誘注云：「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，成唐虞三代之德，敘詩書孔子之意。」是司馬遷、劉向、班固、應劭、劉安皆以孟子師事子思，然此說實缺乏堅實之證據。以孟子與子思的生卒年代考之，孟子生年去子思三十餘年，實無可能受業於子思。崔述（東壁）考此事云：「孔子之卒下至孟子游齊，燕人畔時，一百六十有六年矣。伯魚之卒在顏淵前，則孔子卒時子思當不下十歲。而孟子去齊後，居鄒，之宋，之薛，之滕，爲文公定井田復游於魯而後歸老，則孟子在齊時亦不過六十歲耳。即令子思享年八十，距孟子之生，尚二十餘年，孟子何由受業於子思乎！孟子云：『予未得爲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

周衰之末，戰國縱橫，用兵爭強，以相侵奪。當世取士，務先權謀，以爲上賢，[4] 先王大道，陵遲墮廢。異端並起，若楊朱、墨翟放蕩之言，以干

也。』若由孟子親受業於子思，則當有言其人，以見其傳之有所自，何得但云『人』而已乎！由是言之，孟子必無受業子思之事，史記之言是也。然孟子之學深遠，恐不僅得之於一人，殆如孔子之無常師者然，故但云『私淑諸人』耳。」（《孟子事實錄》卷上，收入：《崔東壁遺書》，顧頡剛編訂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，頁411），當以東壁之說爲是。

3. 趙氏云：「孟子通五經，尤長於《詩》《書》」，可稱的論。清儒陳澧《東塾讀書記》卷三〈孟子〉云：「《孟子》引《詩》者三十，引《書》者十八，論《書》者一，又有似引書而不言書曰者。所謂尤長於詩書者，於此可以窺見矣。其引烝民之詩，以證性善性理之學也；引雨我公田，以證周用助法，考據之學也。小弁之怨，親親也，親親仁也，此由讀經而推求性理之學也，尤理學之圭臬也。蓋性理之學，政治之掣，皆出於詩書，是乃孟子之學也。」然通觀《孟子》全書，則孟學方面甚多，體大思精，原不以《詩》、《書》爲限，誠如焦循〈孟子題辭〉〈疏〉所云：「孟子於《春秋》獨標『亂臣賊子懼』，爲深知孔子作《春秋》之旨。至於道性善，稱堯舜，則於通德類情，變通神化，已洞然於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之道，獨《詩》、《書》云乎哉！」管見以爲，孟子思想之有所會通於《易》者，或在於其言「天道」與「人道」之關係，如〈離婁〉第十二章云：「孟子曰：……是故誠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；不誠，未有能動者也。」在孟子思想中，「人道」尚未從「天道」分化出來，「人」在擴充感通的工夫中，通過自我超越而可以與宇宙最終實體合一，即所謂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」（《孟子・盡心上・1》）也。

4. 戰國時代各國以尚賢爲首務，趙氏之說極是。就時代先後觀之，戰國時代尚賢首見於魏國。魏文侯（在位於445-396 B.C.）禮賢下士，遊士歸之，首開戰國養士之風。其次爲齊國，尤以齊宣王（在位319-301 B.C.）之時，拔舉人才不餘力，養稷下學士，爲尚賢之具體表現。再次爲秦國及趙國，秦以僻處西陲，無文化之包袱，社會階級之限制亦不如中原諸國之森嚴，尚賢政治易於推展；趙在戰國季世與秦互爭雄長，亦大力推行尚賢政治以爭取外交及軍事人才。戰國時代尚賢政治之發展與戰國時代列國國勢之盛衰轉移互爲表裡。誠如錢賓四先生所言，戰國諸國國勢盛衰之轉移，凡經如下之三變：戰國初期，東方霸業自越轉而至魏；中期則東方霸業自魏轉至齊；晚期則自齊轉移至趙而歸於秦。（錢穆，《先秦諸子繫年》，香港，香港大學出版社，1956，下册，頁605-609）尚賢政治之發展及其轉變，亦與戰國之三階段相呼應。由此亦可反映尚賢政治與國勢盛衰之密切關係。戰國群雄之汲汲以拔舉賢才爲務，其理由在此。關於戰國尚賢政治，參考：黃俊傑，《春秋戰國時代尚賢政治的理論與實際》（台北：問學出版社，1977），第四章。范睢對秦昭王（在位於306-251 B.C.）云：「有功者不得不賞，有能者不得不官，勞大者其祿厚，功多者其爵尊，能治衆者其官大。」（《戰國策》，四部備要本，卷5，秦策3，頁3上），此語正道出戰國尚賢政治之實況。

至於戰國各國人才之來源，據嚴耕望先生統計，「大抵太行東南河濟南北之三晉核心及周衛地區爲最密；泰山南北之齊魯，潁汝地區之宋及陳楚次之；兩區合計，土地面積僅約當七國總面積五分之一，而人才幾居四分之三。秦國無學者，而尊顯巴寡婦清與戎人倮兩實業家，其土著人才僅司馬錯、白起、王翦三大將，此皆見其政治、民風之特色。至於荆楚亦惟其核心之江漢地區爲盛，各類人才具備，且人數衆多。戰國後期，楚已舉族遷陳，

時惑者非一。孟子閔悼堯、舜、湯、文、周、孔之業將遂湮微。正塗壅底，仁義荒怠，佞僞馳騁，紅紫亂朱。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，遂以儒道遊於諸侯，思濟斯民；然由不肯枉尺直尋，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，終莫能聽納其說。

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，值炎劉之未奮，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。恥沒世而無聞焉，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。仲尼有云：「我欲託之空言，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」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、萬章之徒難疑答問，又自撰其法度之言，著書七篇，[5] 二百六十一章，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。[6] 包羅天地，揆敘萬類，仁義道德，性命禍福，粲然靡所不載。帝王公侯遵之，則可以致隆平，頌清廟；卿大夫蹈之，則可以尊君父，立忠信；守志厲操者儀之，則可以崇高節，抗浮雲。有風人之託物，〈二雅〉之正言，可謂直而不倨，曲而不屈，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。

孔子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〈雅〉〈頌〉各得其所，乃刪《詩》定《書》

否則人才列史必更多。蓋江漢地區之荊楚故地，華化早被，經濟繁榮，故楚能爲春秋以來之盛國，人才文化固亦其一環也。」參見：嚴耕望，〈戰國學術地理與人才分佈〉，收於《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91 年初版）頁 33-69，引文見頁 64。

5. 趙岐主張《孟子》書乃孟子「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、萬章之徒難疑答問，又自撰其法度之言，著書七篇。」此說乃本於《史記》。司馬遷 (145-86 B.C.) 認爲《孟子》乃孟子周遊列國之後，與學生萬章等人共同撰寫，《史記・孟子荀卿列傳》說：「孟子乃述唐、虞、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如者不合；退而與萬章之徒序《詩》、《書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」這種說法雖不能說是錯誤，但是從《孟子》書的若干內證看來，《孟子》這部書大概仍是以孟子學生所撰的可能性較大。歷來將這層可能性分析的最爲清楚的仍推崔述（東壁，公元 1740-1816），他說：「謂孟子一書爲公孫丑、萬章所纂述者，近是；謂孟子與之同撰者，或孟子所自撰，則非也。《孟子》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議者。如『禹決汝、漢，排淮、泗，而注之江』，『伊尹五就湯，五就桀』之屬，皆於事理未合。東孟子所自著，不應疏略如是，一也。七篇中，稱時君皆與其謚，如梁惠王、襄王、齊宣王、魯平公、鄒穆公皆然；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如是。中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，何以皆稱其謚，二也。七篇中，於孟子之門人多以子稱之，如樂正子、公都子、屋廬子、徐子、陳子皆然；不稱子者無幾。東孟子所自著，恐本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，三也。細玩此書，蓋孟子之門人萬章、公孫丑等所追述，故二子問答之言在七篇中爲最多，而二子在書中亦皆不以『子』稱也。」見《孟子事實錄》卷下，（收入：《崔東壁遺書》，顧頡剛編訂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），頁 433。

6. 趙岐在〈孟子篇敘〉中進一步解釋《孟子》書之章數與字數云：「篇所以七者，天以七紀，璿璣運度，七政分離，聖以布曜，故法之也。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，三時之日數也。不敢比易當期之數，故取其三時。三時者，成歲之要時，故法之也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，可以行五常之道，施七政之紀，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。」此種解釋頗能顯示漢儒天人相應之思想傾向。

，繫《周易》，作《春秋》。孟子退自齊、梁，述堯、舜之道而著作焉，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。

七十子之疇，會集夫子所言，以爲《論語》。《論語》者，五經之鎔鍇，六藝之喉衿也。《孟子》之書，則而象之。[7]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，孔子答以俎豆；梁惠王問利國，孟子對以仁義。宋桓魋欲害孔子，孔子稱：「天生德於予。」魯臧倉毀焉孟子，孟子曰：「臧氏之子，焉能使予不遇哉。」旨意合同，若此者衆。

又有《外書》四篇，〈性善〉、〈辯文〉、〈說孝經〉、〈爲政〉，其文不能弘深，不與內篇相似，似非孟子本眞，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。[8]

孟子既沒後，大道遂絀，逮至亡秦，焚滅經術，坑戮儒生。孟子徒黨盡矣！其書號爲諸子，故篇籍得不泯絕。漢興，除秦虐禁，開延道德，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，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爾雅》皆置博士。後罷傳記博士，獨立五經而已。[9] 訖今諸經通義，得引《孟子》以明事，謂之

---

7. 顧炎武，《日知錄》，卷 10，〈孟子引論語〉條云：「《孟子》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，其載於《論語》者（學不厭而教不倦。里仁爲美。君薨聽於冢宰。大哉堯之爲君也。小子鳴鼓而攻之。吾黨之士狂簡。鄉原德之賊也。惡似而非者。）又多大同而小異，然則夫子之言其不傳於后者多矣，故曰：『仲尼沒而微言絕。』」

8. 趙氏認爲所謂《孟子》〈外書〉四篇，係「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」，其說蓋是，誠如屈萬里先生所說：「就這四篇的標題看來，孟子的時代，既沒有評論文章的風氣，也沒有解說文字的著作，自然不會有『辯文』這樣的題目。而孝經的著成時代，約當在戰國初年，孟子自然也不會『說孝經』。即此兩點，就可以證明它是後人所僞託。太史公只見到七篇；那麼，這僞託的四篇，在太史公彷彿如果已經有了，也必然是另本單行，和內七篇並沒合爲一書。」見：屈萬里，《先秦文史資料考辨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公司，1983）頁 469-470。宋代新喻謝氏所藏《性善辯》一帙，明季姚士粦所撰《孟子外傳》皆屬僞作。」見：屈萬里，〈孟子七篇的編著和孟子外書問題〉，《孔孟學報》，第七期，論之已詳。

9. 錢大昕認爲傳記博士之罷當在漢武帝建元五年（136 B.C.）置五經博士之時（見：《潛研堂答問》），其說蓋是。焦循《正義》云：「《禮記正義》引盧植云：『漢文皇帝令博士諸生，作此〈王制〉之書。』今〈王制〉篇中，制祿爵關市等文，多取諸《孟子》，則孝文時立《孟子》審矣。」。近人劉汝霖論文景時之博士與武帝所立博士之異云：「按武帝之立博士，與文景時有大異者。蓋文景當提倡學術伊始，無論經子，皆使博士講習，各博士職務相同，非有專責也。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孟子》、《爾雅》皆置博士乃使諸博士共講此書，非以諸書各立博士也。轅固、韓嬰、董仲舒皆在景帝時爲博士，不過以祺學爲進身之階而已，非當時以《齊詩》、《韓詩》、《公羊氏春秋》各置博士也。至武帝時，積書既多，須分工治理，於是罷黜百家，專立五經，使博士各掌其經，不復相亂，自是始有專責矣。然當時亦只有經而已，非有各家之學也。各家之學之名，後者先定，先者乃依

博文。[10] 孟子長於譬喻，辭不迫切，而意已獨至，[11] 其言曰：「說《詩》者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；以意逆志，爲得之矣。」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，以解其文，不但施於說《詩》也。今諸解者，往往摭取而說之，其說又多乖異不同。[12] 孟子以來五百餘載，傳之者亦已衆多。

後者而追稱也。故有《大小夏侯》，乃稱前者爲《歐陽氏書》，有《大小戴》乃稱前者爲《后氏》，有《施孟梁丘》，乃稱前者爲《楊氏》。其初只有經之名而已，非專立歐陽后楊之學也。」見：劉汝霖，《漢晉學術編年》（台北：長安出版社，1979）上册，卷二，頁 6-7。

10. 漢人著作多引《孟子》，焦循註之極詳。《正義》云：「如《鹽鐵論》載賢良文學對丞相御史，多本《孟子》之言。而鄭康成註禮箋詩，許慎作《說文解字》，皆引之。其見於《史記》、《兩漢書》、《兩漢紀》，如鄒陽引「不含怒不宿怨」，終軍引「枉尺直尋」，倪寬引「金聲玉振」，王褒引「離婁、公輸」，貢禹引「民飢馬肥」，梅福引「位卑言高」，馮異稱「民之飢渴，易爲飲食」，李淑引「緣木求魚」，鄧俥言「強其君所不能爲忠，彊君所不能爲賊」，馮衍言「臧倉言泰山北海」，班彪引「禱杌春秋」，崔駰言「登牆摟處」，申屠蟠言「處士橫議」，王暢言「貪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」，傳燮言「浩然之氣」，亦當時引以明事之證。」

11. 趙氏云：「孟子長於譬喻」，極具卓識。譬喻，近於今語所謂「類推」，孟子係戰國諸子中最善於透過比喻以進行類推思考方法之思想家。孟子生戰國亂世，「後車數十乘，從者數百人，以傳食於諸侯，所至每與國君分庭抗禮」（《孟子・滕文公下・4》），以堯舜之道強聒時君，以性善說闢楊墨，息「邪說」，更是常常運用類推論證作爲武器。舉例言之，孟子勉滕文公行堯舜之道，改革國政，即引《尚書・說命》：「若藥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」此一日常生活經驗爲喻（《孟子・滕文公上・2》）。孟子與周霄論「出疆必載質」之義，以「農夫之耕」喻「士之仕」（《孟子・滕文公下・3》）。孟子與戴不勝論環境對人的影響，以「一齊人傅之，衆楚人咻之」爲喻（《孟子・滕文公下・6》）。孟子亦以水之「原泉混混，不舍晝夜」喻君子之「有本」（《孟子・離婁下・18》）。而以音樂演奏中「金聲而玉振之」，類比於孔子之爲「集大成」之聖人（《孟子・萬章下・1》），尤能具體說明孔子巧力俱全，聖智兼備之聖人氣象。諸如此類的類推論證，在《孟子》書中俯拾皆是。

12. 漢代解《孟子》者多無可考，焦循《正義》云：「孟子後徵引《孟子》者，如荀卿、韓嬰、董仲舒、劉向、揚雄、王充、班固、張衡、鄭康成、許慎、何休等，皆所謂摭取而說之。漢文時，立《孟子》博士，必有授受之人，惜不可考。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本，不詳得自何人。至《東觀漢紀》言「章帝以《孟子》賜黃香」，則黃香能傳之讀之與否，不可知。劉陶復孟軻，其所以復者不傳。惟《後漢書・儒林傳》云：「程曾字秀升，豫章南昌人，作《孟子章句》。建初三年，舉孝廉，遷海西令。」建初爲章帝年號，則生東漢之初，在趙氏前，專爲孟子之學者，自叔始著。乃其章句不傳，莫可考究。高誘《呂氏春秋敘》自言「正《孟子章句》，……惟《孟子章句》亡。……其訓詁有與《孟子》可參考者，亦藉以窺見其概，故正義引高氏《呂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注爲多。」

余生西京，[13] 世尋丕祚，有自來矣。少蒙義方，訓涉典文。知命之際，

13. 焦循《正義》云：「趙氏爲京兆長陵人。長陵，前漢屬馮翊，後漢屬京兆。京兆爲西漢所都，故云西京。」趙岐生於東漢末年，政治混亂之時代，身受迫害，流離失所，故輾轉徘徊於儒家之入世與道家的遁世之間，頗能反映東漢季世知識份子之思想傾向。

趙氏註孟於「遭屯離蹇，詭姓遁身」之際，「精神遐漂，靡所濟集」之時，雖「聊係志於翰墨，得以亂思遺老」（皆見《孟子題辭》），然實有其入世之用心，此可自其自爲壽藏及其墓中畫像略推一二。《後漢書》本傳云趙岐生前「先自爲壽藏，圖季札、子產、晏嬰、叔向四像居賓位，又自畫其像居主位，皆爲讚頌。」此係中國歷史上營造生壙之最早者（參見：趙翼，《陔餘叢考》，台北：世界書局影印乾隆 56 年刊本，卷 32，「生壙」條），其自畫像亦爲存世史料所見中國美術史上最早之自畫像（參考：谷口鐵雄，〈中國の自畫像——趙岐の場合〉，《美學》46，1961，頁 19-27），頗能顯示趙氏「自我」之覺醒。趙氏在其自營生壙中，畫季札、子產、晏嬰、叔向之像居賓位，自己像居主位，固係希冀死後能與其生平所景仰之先賢共處，然亦反映其所認同之價值取向也。蒲慕州近日指出，西漢中晚期以降，作爲裝飾用之墓中畫像逐漸出現（氏著：《墓葬與生死——中國古代宗教之省思》，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3，頁 201），畫像本身在墓中之作用有如隨葬之明器，死者藉著畫像之存在而希望能到達畫中之境界（同上書，頁 271）。趙氏爲季札等四位先賢畫像，所嚮往之境界在於此四人之得君輔政，平治天下。劉向 (77-6 B.C.)〈戰國策書錄〉云：「五伯之起，尊事周室。五伯之後，時君雖無德，人臣輔其君者，若鄭之子產，晉之叔向，齊之晏嬰，挾君輔政，以並之於中國，猶以義相支持，歌說以相感，聘覲以相交，期會以相一，盟誓以相救。天子之命，猶有所行。會享之國，猶有所恥。小國得有所依，百姓得有所息。故孔子曰：『以禮讓爲國乎何有？』周之流化，豈不大哉！（收入：嚴可均輯，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，光緒 20 年刊本，卷 37，頁 1 上半頁--2 上半頁，引文見頁 1 上半頁）這條史料可以反映東漢時人心目中子產、叔向、晏嬰之形像殆與此近之。東漢黨錮之亂後，儒家學者之政治取向與西漢諸儒不可同日而語，《後漢書・魯恭傳》云魯恭「閉戶講誦，絕人間事，兄弟俱爲諸儒所稱」，可見東漢儒學轉向之一斑，但得君行道之傳統理想仍深植於東漢儒者心中，趙岐之以季札等四人爲典型，當與此種傳統有關。

但就趙岐思想之另一面觀之，趙氏亦頗沾東漢以降知識份子之遁世思想。《後漢書》本傳云：「岐年三十餘，有重疾，臥蓐七年，自慮奄忽，乃爲遺令，敕兄子曰：『大丈夫生世，遯無箕山之操，仕無伊呂之勳，天不我與，復何言哉！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，刻之曰漢有逸人，姓趙名嘉，有志無時，命也奈何！』其後疾瘳。」趙岐自稱「逸人」，實與東漢士人之隱逸風氣相表裡。中國自古以來，即有耿介拔俗，瀟灑出塵之隱逸傳統，此種傳統可分爲兩類：一是經學世界中所見的儒家之逸民，伯夷、叔齊屬之；一是超越世俗的道家之逸民，《論語》中之荷蓧丈人屬之。前者高標名節，《後漢書・逸民傳》中人物多屬此類；後者揚棄政治，遊心玄遠，多見於魏晉六朝（參考：神樂岡昌俊，〈後漢の逸民〉，收入：木村英一博士頌壽紀念會編，《中國哲學の展望と摸索》，東京：創文社，1976，頁 333-346）。但東漢時代之隱逸思想，亦有其轉折變化。松本雅明曾引《漢書・王吉傳》「吉坐昌邑王被刑後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」這一段史料，指出早在西漢宣帝時代即已出現逃避政治的隱逸思想。到了王莽擁權專政之後，士人之隱遁思想從逃避政治轉而爲逃避特定政治人物，如王良「稱病不仕」（《後漢書・王良傳》），洼丹「避世教授，

嬰戚于天。遘屯離蹇，詭姓遁身，[14] 經營八紘之內，十有餘年，心勦形瘵，何勤如焉！嘗息肩弛擔於濟、岱之間，或有溫故知新，雅德君子，矜我劬瘁，睠我皓首，訪論稽古，慰以大道。余困吝之中，精神遐漂，靡所濟集，聊欲係志於翰墨，得以亂思遣老也。惟六籍之學，先覺之士，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。儒家惟有《孟子》，閎遠微妙，蘊奧難見，宜在條理之科。於是乃述己所聞，證以經傳，爲之章句，具載本文，章別其指，分爲上下，凡十四卷。究而言之，不敢以當達者；施於新學，可以寤疑辯惑；愚亦未能審於是非，後之明者，見其違闕，儻改而正諸，不亦宜乎！

專志不仕」（《後漢書・洼丹傳》），皆其著例（以上參考：松本雅明，〈後漢の逃避思想〉，《東方學報》，（東京）第 12 册之 3，1941 年 12 月，頁 67-98）。趙岐之以逸人自況，當與東漢士人之隱遁思想有所關聯。

14. 趙岐一生事蹟頗稱坎坷，《後漢書集解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影印光緒 26 年長沙王氏刊本），卷六十四，〈吳延史盧趙列傳第五十四〉，頁 14-頁 16 下半，言之甚詳，茲據《後漢書》本傳加以歸納，趙岐之一生可分三段：(1)、自出仕地方州郡起到公元 158 年止。趙岐出仕後，即以個性耿直疾惡如仇聞名。公元 158 年他出仕司空掾。(2)、從公元 158 年起，是趙岐生命史的第二個階段。當時中常侍唐衡之兄唐玹出仕京兆地區的虎牙都尉，深爲當時人民所不齒，趙岐也常對唐玹加以批評，唐玹對趙岐頗爲忌恨。公元 158 年，唐玹出仕京兆尹，乃私仇公報，將趙岐的家屬乃宗親，都陷以重法，盡處死刑。趙岐深恐政治迫害及於己身，於是乃亡命逃難，遍歷江、淮、海、岱等地區。自匿姓名，在北海的市場以賣餅爲生。後與北海的望族孫嵩相識，才在孫嵩的庇護之下躲藏在孫嵩的複壁之中數年，寫下了《厄屯歌》，也完成了《孟子》一書的註釋。(3)、趙岐的生命史的第三個階段始於公元 166 年，他在這一年出仕并州刺史，復出政壇，但後來在靈帝初年，因爲黨錮之禍的連累，而有十餘年的不得志。公元 184 年，黃巾之亂起，靈帝起用趙岐爲議郎。獻帝（在位於公元 190-220 年）即位，以趙岐爲太僕。後來，在曹操（公元 155-220 年）、孔融（公元 162-198 年）等人的舉薦之下，趙岐又獲拔擢爲太常，在公元 201 年以九十餘歲高齡逝世。此處所云「知命之際，嬰戚于天」，當係指延熹元年（公元 158）唐玹出任京兆尹，「收岐家屬宗親，盡殺之」之事（《後漢書》本傳）而言。